

何以成为简政模范——晋冀鲁豫边区

□ 林 宁

1942年1月至8月，晋冀鲁豫边区认真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精心筹划在政权系统开展了两次简政，取得了显著成绩，创造了“足供各抗日根据地借镜与效法”的简政改革经验。1942年9月7日《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就推进精兵简政工作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开篇就表扬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紧扣中央要求，统筹推进两大任务

1941年12月，党中央发出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提出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并阐述了精兵简政的意义：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边区党委、政府深刻领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战略意图，把一切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作为首要原则，聚焦爱护、节省和培养民力，在确保完成中央下达的减少政权系统脱离生产工作人员指标的基础上，统筹谋划、聚力推进简政改革和节省民力两大中心任务。

在作生产动员时，宣传精兵简政的重大意义来提振根据地区群众的生产信心。1942年2月边区关于开展春耕运动的指示指出：春耕运动是克服今年财政经济困难的主要关键之一，是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与深入工作的具体步骤。要求各地必须来一个广泛深入的动员，提出“努力春耕，克服困难，迎接接近胜利的两年”等口号，同时与精兵简政联系宣传，说明今年一定减轻负担，最低是不再增加负担，提高与稳定群众生产情绪。

在村政工作简政改革中，减少不必要的开会、站岗放哨、支差等村级政务负担。太行区一般规定了半脱离生产的村干部，每月耗费村级政务时间平均不得超过8日，不脱离生产的村干部不得超过5日，群众不得超过3日，严禁无事听差、拉人到村公所服务的行为。既可节省大笔村级财力开支，更可增加农业生产劳力。

在民兵队伍简政改革中，规定民兵人数不得超过当地居民百分之五，并提出“劳力与武力结合”，以尽量减少人力负担。民兵服务时间从每月7天到10天缩减至每月不得超过2天，农暇时每月不得超过4天。民兵训练时间全年不得超过1个月，其中冬季占2/3，其余为1/3，农忙时停训。

在安置编余人员时，尽力动员支持他们从事生产经营工作。边区政府针对太行区简政后的编余人员出台支持政策，在根据地内有家庭者优先享受春耕贷款之权，并下拨5万元为工商贷款，以贷给外来编余人员经营工商业之用。

及时总结经验，审时度势深化改革

按照中央指示和既定计划，到1942年4月，边区的简政总体上结束。这次简政重点实施两个基本策略，第一个是裁汰驽枝机关，各层级都要减少脱离生产工作人员，党政民等政权系统脱离生产工作人员总数不得超过全边区居民总数的百分之一；第二个是纠正头重脚轻，充实下层，

提高干部质量，增强工作效率。

然而，简政改革之后的边区政权系统马上遭遇了一场抗战大考。1942年5月至6月日寇对边区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辗转“扫荡”，特别是5月出动大量优势兵力集中“扫荡”根据地腹心地区太行区，边区军民经过坚决抗击最终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虽然胜利了，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政权系统的工作和自身建设暴露出不少不适应反“扫荡”战争新形势的弱点。7月，边区政府对反“扫荡”中的各级政权系统工作表现作了深刻反省，其中也及时总结了前阶段简政经验教训。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实施好第二个基本策略，各级政府基本上没有贯彻简政的精神，依然是头重脚轻，没有彻底把应放下去的干部尽量充实下层，故到战时不得不临时分遣干部。

边区坚定彻底简政的决心，顺势将简政改革引向深入，组织开展第二次简政，及时调整基本策略，以适应更加残酷频繁战争环境，加紧准备秋季的反“扫荡”。此次简政率先在太行区开展起来，在8月底前结束。太行区一面认真落实“缩小上层、充实下层”的指示，一面果断纠正第一次简政中一些削弱县以下独立工作能力改革举措，其做法也得到边区政府的支持和推行。

第一次简政在村行政区划改革时由原先的小村制变为大村制，将六七个甚至数十个小行政村合并为大行政村。五月反“扫荡”证明，这种改革不能适应严重的战争环境。因为敌寇“扫荡”，以自然村为目标进行合击清剿，而村指挥部却都放在行政村，干部也都集中于主村，于是战争一来，自然村陷于无领导的状态，行政村也由于孤立而无法坚持。且大行政村远近相距数十里，开会不易，妨碍了民主的发扬，各种问题也不能即时发现与解决。因此太行区在第二次简政时又变回小村制。鉴于第一次简政在领导体制改革时实行专署兼县，削弱对各县的领导作用，同时也妨害所兼县工作之深入，利少弊多，因此在第二次简政时取消专署兼县方式。

贯彻整风精神，提升政风改进效果

1942年2月全党整风运动展开。根据中央部署，边区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开展整风运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下大力气整顿政风，并向各级政权系统开出了药方：切实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领导要求研究性；开会指示要求具体性；制度组织机构要求实际性；同时要求“治病药方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边区党委、政府贯彻整风精神，把正在进行的简政改革与整顿政风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提升政风改进效果。为了推动各级克服主观主义，养成调查研究习惯，提高调查研究的实效，彻底扭转调查研究严重不足的状况，增设边区党委调查研究室并明确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布置调查工作，推动各系统的调查工作，整理研究各方材料。同时借简政改革机会加强做调查研究工作的干部力量，要求边区民政、教育、建设各厅各设专人做调查统计工作，与调查研究室联系配合。

为了纠正各级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政风，力戒政令繁杂，保持政令畅通，提高行政效率，边区政府借简政时机大力改进政府工作机制，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举措。针对命令很多、不重实际，布告多是堂而皇之的大文、实际老百姓看不懂等机关文牍的形式主义作风，要求各级政府下命令，命令的范围应限于干部任免及奖惩事项、颁布条例法令、行政区划之变更、确定制度及制度以外之经费开支、强制执行事项等；制定重要法令政策及计划时，应事先征求下级意见，以期切合实际情况；一切政令、文件、布告，应力求简明通俗易于了解执行。针对对时间的估计不准确、无远见、不及时等发指示、解决问题迟缓的官僚主义作风，规定边区政府、专署及县应建立与加强联合办公制度，以便商讨工作，避免迟缓与矛盾现象；边区政府及专署对电报须在1天内答复，一般公文限3天内答复，须提交会议讨论解决者，应尽量提到最近一次会议解决。

实践证明，简政改革与整风精神显现出聚合效应，形成了政风新气象。1942年9月1日边区党委在给中央的简政工作报告中也总结了政风改进的成效：“简政后在领导上表现有了新的精神，干部开始注意了解民困，体贴民情，有了计算精神，对了解具体情况有了新的启发，工作效率也有些提高，制度严格起来，工作与生活都紧张，战斗化也有进步”。

毛泽覃：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毛泽覃同志纪念碑碑文敬读

□ 钟燕林 马晓敏

在江西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的右前方，伫立着一尊塑像，他身姿俊拔，一身戎装，目光炯炯，浩气凛然。他是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者、红军优秀指挥员、朱毛井冈山会师的重要联络人毛泽覃。

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烈士的英名，1985年，瑞金人民在城郊竖立了毛泽覃烈士全身青铜像，塑像高3米，安放在2.4米高的大石碑座上，碑的正面镶嵌着邓小平题写的“毛泽覃同志纪念碑”八个大字，背面刻着碑文：

毛泽覃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的优秀指挥员，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1905年9月25日毛泽覃出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到湖南水口山开展工人运动。任工人俱乐部教育股委员，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1927年到武汉，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转战赣南、闽西和巩固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曾任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驻吉安办事处主任和后方委员会书记，永（丰）吉（安）泰（和）特委书记，红三军政治部主任，公略中心县委书记、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职。他坚持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和抵制王明的左倾路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坚持游击战争，转战闽赣边界、武夷山区。1935年4月26日率部从长汀四都突围到瑞金红林山区，被敌包围，在激战中英勇牺牲，时年29岁。

毛泽覃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中国共产党瑞金市委
瑞金人民政府 敬立
二〇一〇年六月重修

碑文400余字，概述了毛泽覃烈士的成长战斗历程，倾注了人们对他的崇敬与缅怀，读之令人肃然起敬。

我军早期的一位猛将

毛泽覃是毛泽东和毛泽民的弟

弟。在长兄毛泽东的影响下，毛泽覃走上革命道路。南昌起义时，他担任起义军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成为毛氏三兄弟中走向武装斗争的第一人，后随起义部队南下。1927年冬，毛泽覃被派赴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络。在他的积极联络下，次年4月朱毛胜利会师井冈山，毛泽覃为这次会师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1928年5月，毛泽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参加了龙源口等战斗。1930年1月，毛泽覃任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曾代理军政治委员，与军长黄公略率领全军在赣水两岸开展游击战争。同年10月，他任中共吉安县委书记、红军驻吉安办事处主任，曾以特派员身份协助红二十二军军长陈毅率部回师遂川，恢复了这一带的红色区域。1931年6月，他任中共永（丰）吉（安）泰（和）特委书记兼红军独立第五师政治委员，与师长萧克指挥部队连续取得富田、老营盘等战斗胜利。1933年8月1日，红一方面军在瑞金隆重举行八一建军日的纪念活动，因战功卓著，毛泽覃荣获一枚二等红星奖章。1973年10月，曾与毛泽覃共同战斗过的邓小平在韶山参观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时，见到毛泽覃烈士的遗像，情不自禁地说：“他是我军早期的一位猛将”。

遵守群众纪律的模范

毛泽覃曾说过，“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遵守群众纪律，才能得到群众的真心拥护”。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毛泽覃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并担任中央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带领部分留守红军坚持游击战争。不久，国民党军卷土重来。敌人对中央苏区实行疯狂的“清剿”。所到之处，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妄图使红军和游击队失去安身立足之地。毛泽覃一方面积极率领红军战士寻找机会，消灭敌人，解决物质困难；另一方面教育干部、战士要坚定革命信念、增强胜利信心，并反复提醒大家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

1935年2月，毛泽覃随中央分局驻扎在于都黄龙的井塘村，住在红军家属周带发家的厅堂里。他经常抽空帮助房东谢大嫂挑水、劈柴，并派人

帮助她犁田，使谢大嫂很受感动。春节那天，谢带发特地送来年糕米糕给毛泽覃拜年。毛泽覃不便推辞，就拿出了些当时苏区紧缺的火柴等物品回赠给她。

根据中央电报指示，中央分局决定将被围困的红军部队和地方人员分成九路突围。毛泽覃率一个连向闽赣边转移。当他率部从会昌的白鹅出发，又一次经过井塘村时，部队在井塘村吃午饭，谢带发多给毛泽覃做了一碗菜干，并特地放了一些他喜欢吃的辣椒。毛泽覃当即掏出五角钱交给谢带发。谢带发说什么也不肯收，她知道红军战士行军作战都是为贫苦工农打天下，他们连性命都不顾，自己怎么好意思收那碗菜干钱呢？毛泽覃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就耐心地解释道：“我们红军是有纪律的，买卖公平，你不收钱，我宁可不要这碗菜干了。”直到谢带发收下钱，他才吃了起来。

坚毅果敢的指挥员

面对敌人频繁的军事进攻和残酷的经济封锁，毛泽覃带领留守红军战士，遭受到难以想象的困难，“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他们以竹笋、野果充饥，用茅草、树叶当被，在大山里同敌人周旋。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和战士们转移到瑞金安治乡（今泽覃乡）黄鹄口附近的山中，为了不打搅群众，部队隐蔽在一幢空闲的纸槽之中。26日凌晨，夜深人静，警惕的毛泽覃在纸槽外面发现了敌情，他立即叫醒正在酣睡的同志们，急促而坚定地说：“我们被包围了，大家快从纸槽侧门突围出去吧，我掩护你们……”说完，就立即冲 to 屋外，沉着应战。战士们只好服从命令，迅速撤出。

敌人很快包围过来，毛泽覃知道这次凶多吉少，他把身上的红星奖章拿了出来，深情地注视了一下，悄悄地放在一块大石下面。这时，敌人枪弹雨点般打了过来。突然，一颗子弹



黄负生：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的宣传家

□ 尧芳芳

1922年2月，为了揭露军阀赵恒惕惨杀湖南早期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的罪行，在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途中，毛泽东停驻黄土坡中共武汉区委机关，并多次探望卧病在床的黄负生。在与黄负生交谈期间，毛泽东称赞：“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蔡和森是党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湖南学联机关刊物《湘江评论》的主持人之一，毛泽东将黄负生与蔡和森相提并论，可见对黄负生革命理论宣传工作的高度肯定。

封建制度的批判者：关注群众疾苦，揭露军阀本质

黄负生年幼时父亲早逝，家道中落，靠母亲针线纺织和亲友的救济得以上学读书。由于亲身经历过清苦生活，使他对待豺狼当道、民穷财尽的社会状况甚为不满。他忧国忧民，体恤人民疾苦，十分关切社会底层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注重批判封建社会的剥削和压迫制度，尤其对封建社会的没落和强权政治的黑暗十分痛恨。

在新思想的冲击下，黄负生发表了大量揭露社会底层民众惨淡生活的文章，如1916年发表的小说《孤

儿》，1921年发表的散文小说《和平之死》以及诗歌《湘鄂战争》等，通过运用不同的文体，描述了社会不同底层人群，包括孤儿、老人、鞋匠、士兵、奴隶等弱者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对军阀阶级压迫剥削制度的痛恨。黄负生认为要改变社会现状，必须揭露封建军阀的虚伪面目，打破民众对军阀统治的幻想。1921年8月，黄负生在《武汉星期评论》发表《军阀脚下底自治》一文，揭示了军阀自治运动“受军阀底施与，受军阀底卵翼”的本质，主张对这种“冒牌自治底军阀和官僚根本推翻！”黄负生的这一思想表明他已经站在了时代的前列，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来观察社会问题。9月，在《湘鄂战争》一诗中，黄负生更是发出“战士之命贱如狗，将军挥金如粪土”的感叹，讽刺封建军阀统治下混乱的社会秩序，警醒广大群众不要做军阀黑暗统治的工具和牺牲品。

工人自己的宣传家：讴歌劳工神圣，领导工人运动

无产阶级的工人运动，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途径。黄负生一方面十分关注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另一方面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积极推动和领导工人运动，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



击中了毛泽覃右脚，他正要举枪还击，接着，头部又被打伤，鲜血顺着脸颊直往下流，他强忍着剧痛，顽强地继续战斗。不料，一个敌军绕到他的身后，朝他开了一枪，子弹穿进了毛泽覃胸膛，毛泽覃高大的身躯倒了下去，殷红的鲜血染红了门前的草地，他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从缴获敌人的电台中听闻毛泽覃牺牲的消息后，毛泽东对毛泽民说：“我们突围后，那里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我估计小弟牺牲有些日子了。母亲在世时，曾把我召到床前专门向我交代，一定要照料好小弟。我是没有尽到当大哥的责任啊！”兄弟俩为之悲痛不已。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在上屋场旧居里端详墙上毛泽覃烈士的遗像，心情难平：“这是我的泽覃六弟。他很聪明，他的胆量比我还大哩！”毛泽东曾对秘书田家英说：“我的弟弟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工人运动的重要启蒙者。为了唤醒民众的觉悟，扩大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引导工人运动的发展，黄负生如实报道工人的生存现状，领导工人罢工运动的开展。五四运动爆发后，黄负生在《学生周刊》上用白话文进行宣传工作，与恽代英等人在汉口阅马场召集会议，号召工人、商人、学生开展罢工、罢市、罢课运动。1920年，黄负生着手研究汉口地区码头劳动工人的生活状况，与刘子通、陈潭秋在《新青年》合发《汉口苦力状况》一文，发出了“汉口劳动界之最苦者，莫苦于驮货一类”“彼等所受之苦痛，实人生之最难堪者”的感慨。1921年5月，汉口租界发生人力车工人罢工运动，黄负生热情接待工人代表，了解工人诉求和罢工斗争的开展，总结罢工斗争经验并如实报道工人罢工情况，推动了罢工运动的发展。为了更好地领导工人运动，黄负生积极推动成立工人运动领导机关。10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黄负生积极参与分部工作，领导工人运动，为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运动的开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正当黄负生不辞辛苦、激情昂扬地奋战在党的革命战线之际，却因拒不交出揭露中华大学政治黑暗面的文章原稿和作者信息，被强权势力威逼利诱并施以暴力，致其肺病加重，于1922年4月7日不幸逝世。纵观黄负生革命生涯，尽管短暂，但他为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宣传以及工人、学生运动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